说纛

夏志峰

史籍中关于纛(dào)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项羽本纪》:“纪信乘黄屋车,傅左纛。”裴骃集解:“李斐曰,纛,毛羽幢也,在乘舆车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氂牛尾为之如斗,或在騑头,或在衡上也。” 蔡邕《独断》则说纛“在最后左騑马鬃上”。《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除引裴骃集解外,还加注“应劭曰,雉尾为之,在左骖当镳上。”《后汉书·舆服志上》说:“左纛以氂牛尾为之,在左騑马轭上。”从汉唐学者对纛的释义看,纛是古代车马的饰件,其制作材料是牦牛尾或雉尾,形制与旄、羽葆相近,安置于左边马的头上、镳上、轭上或车衡上。考古发现的纛最早见于东周时期的燕地和楚地,辽宁兴城、沈阳等地青铜时代墓葬出土过青铜制作的纛,湖北、湖南、河南等地的楚墓中出土过漆木制作的纛。其形制大致有矮纛和高纛两类:矮纛大体呈椭圆形,顶端或平或弧,上有若干小孔以安置毛羽,高4—6厘米;高纛则是以矮纛为基座,其上再立直杆,杆首有若干小孔以安置毛羽,通高15—24厘米。秦始皇陵铜车马之右骖马头顶皆置高纛,西汉南越王墓也出土过类似的铜高纛杆。

汉魏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中屡见纛的形象。从图像观察,既有单骑马头上置纛,也有在车驾左骖马头或右骖马头上置纛,还有四马头顶皆置纛,镳上置纛者少见,未见轭上和衡上置纛。四川广汉东南乡出土的汉导车画像砖、栈车画像砖,马头上置矮纛;陕西定边郝滩汉墓车马出行图壁画,马头上置黑色矮纛(图1);甘肃酒泉果园乡魏晋壁画墓出行图,有两个执旄者和一骑吏所骑之马,马头上置黑色矮纛;河南新野樊集出土的汉射鸟、西王母、驷马安车画像砖,四马头顶皆置高纛(图2);陕西绥德汉墓门楣之牵马图,马头顶置扇形高纛(图3),其形体由若干呈倒三角形的物件组成,这种形象应是修剪过的雉羽,姑且称之为羽状纛;甘肃嘉峪关新城5号魏晋壁画墓之狩猎图,猎手所骑之马头上置黑色高纛(图4);河南邓州南朝画像砖墓出土的铠甲战马画像砖和运粮画像砖、江苏丹阳南朝画像砖墓东西壁之铠马武士画像砖和骑吏画像砖,马头上皆置高纛;四川德阳柏隆张出土的汉代斧车画像砖和四维轺车画像砖,马头和镳衔结合部皆置羽状纛(图5);山东沂南汉墓中室北壁横额之车马出行图,马头置高纛,镳衔结合处置羽状纛,马勒上还缀有一个或两个以软绳连接的纛,随风飘起,这种安置方法在文献中无记录。

马以纛为饰应来源于东周时期神话传说中的仙界动物。彼时关于神仙的传说流行于临海的燕齐一带,《史记·封禅书》说:“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依于鬼神之事”,燕昭王、齐威王、齐宣王都是他们的信徒。从《楚辞》和楚墓出土文物中,也可感受到强烈的神秘浪漫气息。秦始皇和汉武帝都热衷神仙方术,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中,神仙、升仙也是常见的题材。汉画所表现的神兽、神鸟形象与普通动物不同,它们的头上都长着呈“C”“7”“T”“J”“S”等不同形状的物件,或稳重,或飘逸,高低有差、姿态各异。聊举几例:山东临沂吴白庄汉墓立柱第二层刻两麒麟画像,其头顶生长高纛状物(图6);四川彭山一号汉代石棺两侧画像,上下皆刻翼兽,兽头上长着形状不同的高纛状物,另有一只凤鸟头顶长高纛状冠;汉画中常见的凤鸟、朱雀头上长着向后飘逸的“S”形等各类异形物件。神兽、神鸟头上生长的各形物件,是它们区别于普通动物的重要标志。汉画中车马形象甚多,马头上立纛者甚少,这种模仿仙界动物形象而制作的纛,应是良种马的特殊标记。马是古代军事、交通运输和生产领域极为重要的资产,良种马因为珍稀,才会有伯乐、九方皋相马故事流传。汉初大乱初定,社会经济尚未恢复。《史记·平准书》说:“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黄屋左纛其实是无奈的选择。《大宛列传》载汉武帝遣贰师将军李广利攻大宛取汗血宝马事,显示出那时对良种马的迫切需求。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看,汉代并未形成严格的左纛制度。从魏晋开始直到唐宋时期,黄屋左纛才成为皇帝专用的车驾,权臣只能在其葬仪上享受一次黄屋左纛的虚荣。

图1 汉车马出行图壁画局部,陕西定边县郝滩汉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图2 汉射鸟、西王母、驷马安车画像砖局部,河南新野县樊集汉墓出土,新野汉画像砖博物馆藏

图3 汉牵马图局部,陕西绥德汉墓出土,绥德县博物馆藏

图4 魏晋狩猎图壁画局部, 甘肃嘉峪关市新城5号墓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图5 汉四维轺车画像砖,四川德阳市柏隆张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图6 汉墓立柱画像局部,山东临沂吴白庄汉墓出土,临沂市博物馆藏

因纛的形状和制作材料与旄、羽葆相近,魏晋以后,将旄、羽葆皆称为纛。宋高承《事物纪原》、王应麟《玉海》皆说纛“盖旄头之遗象”。甘肃嘉峪关新城5号魏晋壁画墓之屯营图,中央大帐旁立六杆旄,应是《新唐书·百官志》所说的节度使树六纛的雏形。河北磁县高洋墓壁画东西两壁第45、第47人所执仪仗亦应为纛,其形为三叉戟下悬一红带编缀的旄,是年代较晚的旄头形象的纛。

隋唐以后,在纛下加挂旗帜为纛旗,文献上仍称为纛,又以皂纛最常见。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卤簿图中,有旗队8人,领先者举黑色纛旗,顶端置黑色旄头,旗面上画黑色圆圈,旗尾飘四条黑白相间的雉尾纹旆。乾县章怀太子墓壁画中段的出行图中,也有一黑色纛旗,顶端置黑色旄头,旗尾飘六条黑白相间的雉尾纹旆。懿德太子墓西壁仪卫图中的黑色纛旗,形制与前者同,旗尾飘七条黑白相间的雉尾纹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宋元时期的《大驾卤簿图》,队列中有一黑色纛旗,顶端置黑纛,旗幅上有黑白相间的纹样,旗尾飘三条黑白相间的旆,与《宋史·仪卫志》所记“皂边皂旆”相合。据《明会典》《钦定大清会典》《八旬万寿盛典》等书记载,明代大驾卤簿中有皂纛和红纛,清代大驾卤簿中有五色龙纛、前锋纛、护军纛、骁骑纛等数十种,繁多冗杂。

纛也出现于丧礼之中。《周礼·地官·乡师》:“及葬,执纛以与匠师御匶而治役。”《尔雅》曰:“纛,翳也,以指麾翣柩之役,正其行列进退。”丧礼中的纛有等级之分,据杜佑《通典》卷一〇八:“纛竿,凡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魌头。五品以上纛竿九尺,六品以上长六尺。”宋王溥《唐会要》所说尺寸与之小异,《五代会要》卷八说:“无官品者勿用”。

纛还是军权的象征。宋许洞《虎钤经》卷七:“旗帜者,军中之标表也,以门旗为首,竿上置金铜珠,大纛深红八幅,树大将牙帐前。”军旅出动还有祭纛的仪式,也称为祃纛。《新唐书·康日知传》:“乃祃纛黄堂前”;唐独孤及《毘陵集》和柳宗元《柳河东集》都录有《祭纛文》;《虎钤经》中有《祃六纛旗文》。甚者还有以人祭纛的习俗,《旧唐书·李忠臣传》:“擒大首领阿布离,斩以祭纛釁鼓”;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突厥以人祭纛”;《宋史·礼志》第七十三详记了彼时祭纛的全过程。

明代始建庙祀纛。清秦蕙田《五礼通考》:“洪武元年十二月庚寅,立旗纛庙”。《明会典》:“凡各处守御官俱于公廨后筑台,立旗纛庙,设军牙、六旗纛神位,春祭用惊蛰日,秋祭用霜降日。”据地方志所载,很多地方皆建有旗纛庙,一些古建筑保存至今。

文献中与纛音义相同的字还有翿。《诗·王风·君子阳阳》:“君子陶陶,左执翿,右招我由敖。”孔颖达疏:“翿,纛也。李巡曰,翿,舞者所持纛也;孙炎曰,舞者所持羽也,又云:纛,翳也;郭璞云,所持以自蔽翳也。”《说文》无纛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翿、翻、纛同字”。隋代以后的史书有关乐舞的记载中,有引舞者一至二人执纛。虽然形状与前述之纛相近,其功能却不可同日而语。

陕西华阴西岳庙出土唐代纪年方砖浅析

刘帆

陕西华阴西岳庙是历代祭祀华山的场所。西岳庙创建于西汉武帝时期,经历代扩建重建,到清代达到鼎盛。1996—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为配合西岳庙修复工程,对西岳庙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唐代天宝、大和及大中纪年铭方砖,弥补了唐代修葺西岳庙的历史记录。本文就此作初步分析。

西岳庙出土唐代纪年方砖概况

“天宝九载”莲花纹方砖 共7块。尺寸近似。均为泥质灰陶,火候较高,质地坚硬。方砖正面四周内填联珠的阳线纹构成方形框边,中心模印楷书“天宝九载”4字,四字旋读。外饰内填连珠纹的阳线重环纹,重环纹外饰十二瓣带蒂莲花纹,花瓣呈圆角长方形。莲花纹外饰三环纹,三环纹间,内填唐草纹一周,外填联珠纹一周。方形框边的内侧四角各饰一朵草花纹。方砖的侧面,均有用刀削正的痕迹。七块方砖的正面纹饰相同,但字体稍有差异。砖底面均饰绳纹。

图1

标本1制作精细,字体工整,“九”字一撇长而斜直,竖折勾之折处呈九十度。边长37.5厘米,厚8.5厘米(图1)。

图2

标本2残一角,字体粗而草率,印迹浑晕不清。“宝”“载”二字不清,“九”字一撇长而斜直。长38.5厘米,宽37厘米,厚8厘米(图2)。

“大和”纪年方砖 出土4件,其中一件完整。阴面饰方格纹和网格纹,网格纹之间印有5行“大和”二字。方砖长34厘米,宽31.5厘米,厚5厘米。

“大中”纪年方砖 仅发现1件,残缺。残长20厘米,残宽31.5厘米,厚7厘米。阴面上沿饰有网格纹,中部残存4行“大中”二字。

西岳庙纪年方砖反映的唐代岳庙修建史实

唐代以前的西岳庙修建简况 唐以前西岳庙的修建,文献记载不多,汉《西岳华山庙碑》载“在汉中叶,建设宇堂”。东汉光和二年(179),弘农太守樊毅以庙舍旧久,墙屋倾亚,特部行事荀斑与县令先谠,以渐补治。北魏文成皇帝即位三年正月,遣有司诣华岳,修庙立碑。北魏大统七年(541)命华山郡守杨子昕重修。隋“大业十年(614),祀华岳,筑场于庙侧”“十三年(617)有事于华山”。

从西岳庙考古工作得知,南北朝时期庙址位于今庙内的中部,庙域南起今庙内的金城门,北到灏灵殿之后13米处,平面布局呈方形,单垣孤殿,占地面积约18亩。虽在庙内未发现隋代的建筑遗迹,但以“定”为编号的条砖证明了隋代时期也对西岳庙有修缮之举,可能与隋“大业十三年有事于华山”有关。

唐玄宗对西岳庙的维修 唐代对西岳庙的修建,多无文献记载。庙内出土的唐代纪年方砖证实了唐代曾对西岳庙有过多次修葺。《华阴县志》云:“庙自汉武帝建,始唐增雄丽。”唐代的西岳庙何时“始增雄丽”?庙内发现的“天宝九载”莲花纹方砖印证了这一事实。

西岳神在唐代一度受到冷落,至唐玄宗时,祭祀制度、礼仪渐隆,封华岳神为金天王,西岳山神崇拜盛极一时。《旧唐书·礼仪志三》载:“元宗乙酉岁生,以华岳当本命,先天元年(712)七月正,八月癸丑,封华岳神为金天王。”唐玄宗在后期不仅笃信“成仙长生”之术,而且尊崇华山之神,并以华山为本命,试图达到“以功施四海为长生,以业传万世为不死焉”, 还自以为功过五帝,德比肩伏羲、周文,准备在华山“龙驾帝服,封天禅地”。

据《资治通鉴》载唐玄宗天宝元年以“函谷宝符,潜应年号;先天不违,请于尊号加‘天宝’字。”天宝三载正月丙辰朔,依《尔雅·释天》云:“周曰年,唐虞曰载”,取四时终始之意,改年为载。“天宝九载春,正月,群臣屡表请封西岳,许之。”“三月,上命御史大夫王珣凿华山路,设坛场于其上。”“是春,关中旱。辛亥,岳祠灾。制罢封西岳。”

唐玄宗欲封禅西岳,为了表示对华山神的尊崇,必然要修葺或扩建西岳庙。虽然史书未记载这次修庙工程,但庙内出土的“天宝九载”莲花纹方砖,体厚质优,纹饰华丽,可为大修岳庙之佐证。西岳庙考古工作还发现了唐代的殿堂基址,唐代西岳庙的前殿基址叠压在现存的灏灵殿之下,其规模大小,与现存的灏灵殿相近。后殿南距前殿约13米,在后殿室内壁面上,还保存有壁画残迹,因墙的上部已破坏,仅残存人物的下肢部分。壁画高出室内地面10至30厘米,西、北两壁上各有5个人物。从人物的站立形态和衣着看,两组人物均为自然站立状,似有迎接对语之意。壁画以工笔法绘制而成,地仗用白灰水粉刷而成,壁画使用的颜色有红、褐红、粉红、黑、黄、白六种。从壁画残迹看,用笔线条流畅,颜色艳丽。在后殿台明中出土有唐代莲花纹瓦当和板瓦、筒瓦、“开元通宝”钱等遗物。在后殿东北部约44米处还发现砖铺地面,残存面积约5.4平方米。地面用方砖铺成,整齐平坦。铺地砖有“天宝九载”莲花纹方砖和素面方砖。从遗迹的形式和结构分析,似为一处建筑物的砖铺地面残迹。从台明中出土的“开元通宝”钱分析,该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与扩拓庙域的时间相同,当为唐玄宗天宝九年(750)修庙工程中所建。

基于以上分析,唐代拓展庙域之事,可能是天宝九年(750)为封禅西岳而进行的修庙工程所为。依据西岳庙考古资料,我们得知,唐天宝九年在南北朝时期的庙域基础上首次将庙域向北进行了扩建,南北长约147米,东西宽111米,占地面积约1.63万平方米。这是西岳庙发展史中的一个辉煌时期,它革益了南北朝时期的单垣孤殿之制,使主体建筑增益为“吕”字形,开创了西岳庙“前堂后室”之制的先河。

唐代后期对西岳庙的维修 唐代经过安史之乱后,国力锐减,华山因地理位置特殊受到王室重视。唐李商隐《修西岳庙碑记》云:“开成元年(836)九月遣侍中太宰征东大将军辽西常英冠、将军曹尚书河内公荀尚,立节将军安定侯直勤侯尼须,建立殿庙,造碑阙。”而唐大和(827—835)纪年方砖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证实了唐文宗在位期间曾修庙一事,工程从“大和”年间开始,到开成元年工程竣工。到唐宣宗时,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百姓日渐富裕,呈现出“中兴”局面。作为与国家命运相系的西岳华山,唐宣宗对西岳庙必有举措,大中纪年方砖,印证了唐大中年间修葺的事实。

唐代是西岳庙历史发展上的重要时期,但因文献记载甚少,无法确定扩修、修缮工程的时间,出土的纪年方砖填补了史料缺失。从唐代的建筑材料中,特别是方砖正面纹饰华丽讲究和部分“青掍瓦”瓦件,表面经打磨,黑而光滑来看,再现了唐文化的特点和繁荣,也反映了唐王朝对西岳庙的重视。“天宝九年”西岳庙庙域的增益,为后世庙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方寸之间 自有天地

——定安县博物馆藏印解读

周冼强

张岳崧印 飞伯印字非潜号香泉印 筱农吟馆印 莫氏东初所藏印 亦寿考印 臣莫玺章印(正:臣莫玺章 背:字信甫号静州)

许慎《说文解字》:“印,执政所执信也。”印章在春秋时代已普遍使用。秦之前皆称“玺”,极少数称“印”。到了秦代,印的名称及使用有了严格的规定,皇帝的印章称“玺”,余者称“印”。自汉魏晋有统一印制,南北朝因之。隋唐之后,印体、印文变化发展。

印章种类繁多,分为官印和私印两类。官印即官方所用之印章,私印为官印以外印章统称。海南省定安县博物馆收藏印章约30枚,基本为本地名人私印,印文以篆体为主,印章中朱文大都配上阳线边栏;白文少有阳线边栏。主要有以下几类:

姓名印、字号印、名字合印、总印合称**名字印**。印章作为信用的象征,以姓名印为正印,字号印为闲印杂用。

姓名印。一般在姓名后面加“印”“之印”“印章”“印信”“章”“之章”等,或名后加“印”“之印”“私印”“章”“印章”等的名印,姓后加“氏”或在姓前同时加地名的姓氏印,如“金陵某氏”“燕京某氏”等。姓名印是取信之物,在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尤其是书画艺术家,一幅作品可以无款但不能少印,无印则不能称为完整作品。

“张岳崧印”为清代寿山石质方印,印文为朱文篆体,右上起逆读“张岳崧印”四字,有阳线边栏,为回文印。回文印方式有多种,最常见的如古代双名印,为使名字相连,避免拆散在左右两侧,从姓开始采用从右到左、从左到右逆时针方向排列,即在姓下加“印”字,作“姓印某某”。回文应读作“姓某某印”。如单姓单名印也采取回文式,则必须加“之印”或“印信”等等。张岳崧(1773—1842),字子骏,又字翰山、澥山,号觉庵、指山。今海南省定安县龙湖镇高林村人。清嘉庆十四年(1809)己巳恩科一甲第三名进士,系海南科举时代唯一的探花,与丘濬、海瑞、王佐并誉为海南四大才子。

“张熊光印”为清代寿山石质方印,印文为白文篆体,上下行回文式排列,右上起逆读“张熊光印”四字。印钮为狮钮。张熊光,字锡卿(1825—1852),探花张岳崧之孙,张钟銮之子,清代庠生。

“莫受松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印文为白文篆体,右上起顺读为“莫受松印”四字。

“兆文”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印文为朱文篆体,右起横读 “兆文”二字,印面有阳线边栏,印钮为兽钮,浮雕一只瞪眼顽猴,刀法粗犷。《光绪定安县志》记载:莫兆文,字昌廷,号毅农,景环子,张岳崧门婿。

字号印。即用人的字或号作印文入印。字号是古代文人的癖好,除了有一个正式姓名外,还要给自己起几个字、号或多个别号,以示风雅。字号印起源于唐,从宋代开始流行至今。

字印,旧名表德印。字一般只起两字,刻成印章,大多后面不加“印”“之印”,加“姓”的,作“姓某某”,也有姓的下面加“氏”字,作“姓氏某某”,如“赵氏子昂”,也可以字下加“氏”,作“某某氏”,或在字下加“父”,即“甫”的异体字。号印,以号或别号入印,如苏轼有“东坡居士”印,赵孟頫有“松雪道人”印等。定安县博物馆馆藏“筱源”印、“小源”印、“子深”印、“子彰”印均为字印,且印面均有阳线边栏。

“飞伯印字非潜号香泉”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印文为朱文篆体。此印主人名飞伯,字非潜,号香泉,集名、字、号刻为一印。将姓名、字、号并刻为一印的称为“名字合印”。

斋馆印,是以文人书斋、居室的雅称刻制的印章,如“楼、阁、馆、巢、院、斋、轩、堂”不胜枚举。

“筱农吟馆”印,清代寿山石不规则印体,印文为朱文篆体,右上起横读 “筱农吟馆”四字,印面有阳线边栏。

印章发展到了唐宋两代,用以收藏、鉴赏、校订的专用印记——**收藏鉴赏印**开始出现。它兴于唐而盛于宋,多用于钤盖书画文物。收藏类印多加“收藏”“珍藏”“藏书”“藏画”“珍玩”“密玩”“图书”等字样。鉴赏类多加“鉴赏”“珍赏”“清赏”“心赏”“过目”“眼福”等字样。校订类印多加“校订”“考定”“审定”“鉴定”“甄定”等字样。

“莫氏东初所藏”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通3.65厘米,印文为朱文篆体,右上起顺读“莫氏东初所藏”六字。“东初”印为不规则随形印,寿山石质,印文为朱文篆体,右起横读“东初”二字。字体行笔中圆畅洒脱,印身四周所刻松树和荷花,与莫氏东初所藏印为同一人的私印。

成语诗文印,属闲章类。成语印盛行于宋元,印文刻以诗文、成语、名言、俗谚,或牢骚、风月、佛道等语入印,进一步使篆刻由以往单纯的镌刻官职、名号的实用艺术,发展成为独立的具有文学含义的欣赏艺术。

定安县博物馆馆藏“千里怀人”印和“十里荷香”印即属于成语诗文印。

吉语印,即印文刻吉祥语。如汉印中常见的“大利”“日利”“大幸”“长乐”“长幸”“长富”“宜子孙”“长康寿”“永安宁”“日入千石”“日利千万”等,皆属此类。也有在姓名上下附加吉语者,多见于汉代两面印中。

“亦寿考”印为清代寿山石质方印,通5.3厘米,印文为白文篆体,自上而下顺读“亦寿考”三字。

两面印,古代带钮的印章,大都是一面印,多是姓名印,方形,印文的字体比较规范。也有两面印或多面印。印章的两面都有印文,称为两面印。两面印多是私印,始于秦,盛于汉。印文有一面刻姓,一面刻名,或一面刻姓名,另一面刻表字、臣某、妾某、吉语、鸟、兽、鱼、虫等。也有两面吉语印、两面肖形印、两面图案印等。两面印、多面印一般不能有印钮,只在中间凿一小孔以便穿带,称“穿带印”。

“臣莫玺章”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两面印,印文为篆体,白文面右上起顺读“臣莫玺章”,朱文面右上起顺读“字信甫号静州”。

“臣莫翔龙”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高5厘米,两面印,印文为篆体,白文面右上起顺读“臣莫翔龙”,朱文面右上起顺读“字仲举号凌霄”。

“林璋器”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印文篆体,双面印,白文面上下行回文式排列,右上起逆读“林璋器印”四字;朱文面右起横读“香甫”二字,印有阳线边栏。

“莫敬谦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印文为白文篆体,上下行回文式排列,右上起逆读“莫敬谦印”四字,属姓名印。

“莫氏精谦”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印文为白文篆体,上下行回文式排列,右上起逆读“莫氏精谦”四字,为名印。印文字体排列整齐,字体笔画精细工整。

“敬谦私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印文篆体,双面印,白文面右起顺读“敬谦私印”四字;朱文面右起横读“少农”二字,印有阳线边栏。

“少农”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印文为朱文篆体,右起横读“少农”二字。此以莫敬谦的号为印,属字号印。

“子英学隶”印为清代寿山石方印,印文为朱文篆体,右起横读“子英学隶”四字。边有阳线边栏。莫敬谦,字子英,此印以莫敬谦的字为印。

“五雷经錄之印”为明代铜质方印,印台较薄,有一短矩形无孔鼻钮,印背上刻有一“上”字标记,印文为朱文九叠篆文,右上起顺读“五雷经錄之印”六字,为道教法器,印文即是符文。

海南岛孤悬海外,远离中原,从宋代开始,随着社会经济、航海技术和海外贸易的高度发展,大量移民定居海南,促进了海南岛与中原的联系交流,海南岛经济和文化开始快速发展。明洪武时期,海南岛被明太祖盛赞为南溟奇甸。明清时海南文化兴盛,人才辈出。与此相关的书法作品、印章、砚台等即是明清海南文化兴盛的历史见证。定安县博物馆收藏的本地名人印章对研究当地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值得深入研究和科学保护。